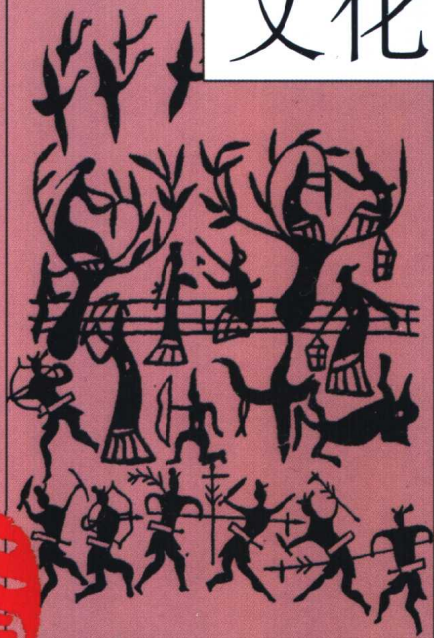


语言与文化

罗常培
著

北京出版社



小
书

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

语言与文化

罗常培 著

北京出版社



小
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言与文化/罗常培著.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3
(大家小书·第3辑)

ISBN 7-200-05076-8

I. 语... II. 罗... III. 语言—关系—文化—
研究 IV. H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093871号

·大家小书·

语言与文化

YUYAN YU WENHUA

罗常培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朝阳区燕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32开本 7.625印张 132千字
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 000

ISBN 7-200-05076-8

1·800 定价: 13.00元

序 言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



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語文發展和社會
發展聯系起來加
深我們的研究

吳玉章

一九五十年一月

(吳玉章為本書題詞)



判的眼光，因此在评介西方有关学术论著时，能一语中的。他在同赵元任、李方桂先生合译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时，实际是边翻译、边增补订正，为原著者所钦服，也为翻译世界学术名著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先生的强项原本是汉语音韵学和语音学，他用现代语音学的术语和发音原理把被古人弄得艰深难懂的“天书”，化玄奥为浅显，拓展了音韵学研究的新天地。一本七八万字的《汉语音韵学导论》（原名《中国音韵学导论》），八易其稿，整整经历了25年，才在1950年出版，他还想把它用语体文重新改写。他是一位真正看重“小书”的权威“大家”。

语言学的敏感和与时俱进的性格，使他每一本著作都有一个新的境界。例如，继《厦门音系》之后，1933年夏，先生到青岛，乍一遇见游国恩先生，就发现临川方言三个音韵特点，因而产生了第二部方言著作《临川音系》。他检索前人著作，发现70年前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的著作所论过于简略，就自己努力垦辟这块土地。结合方志、史籍、族谱和已有论著，先生在完成《临川音系》研究的同时，写出方言与社会历史移民关系的论述《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见本书附录三）。这就是说，从上世纪30年代起，先生研究语言就已经不把研究的视角局限在语言本身的范围内了。

抗日战争期间，罗先生随学校南迁到昆明西南联

序 言

王 均

本书是一位开拓型的语言学大师罗常培先生撰写的一本探索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小书，被认为是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

罗常培（1899—1958）字莘田（心恬），号恬庵。满族。他没有家学渊源的门第优势，全凭“玩儿命的苦干”，而成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他一生严格要求自己，热心帮助他人，热情培植后辈，披荆斩棘，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途径，成为语言学界众所公认的承前启后的学术带头人，是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创所第一任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从1928年起，罗先生曾先后应聘担任西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等职。他对传统音韵学有深厚的功底，既熟悉古代和当代的音韵事实和研究成果，有自己的重大贡献，又关注国际学术界的新动向、新信息，对近人和西方汉学家的中国音韵学论著有锐利批

大。在日机轰炸之中，先生想到费孝通先生在《关于功能派文化论》里说他老师马邻诺斯基（B Malinowski）教授在第一次欧战期间在新几内亚之北、所罗门岛之西的一个叫做 Trobriand 小岛上工作，使该岛成为功能人类学的发祥地的故事，于是他把研究方向从音韵学和方言研究转向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方面，尽量发掘云南这块语言学的黄金地。他不仅鼓励他的学生这样做，他自己也以身作则，调查了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仅眼睛看着语言，更注意语言与社会、与文化的关系。他随时随地搜集资料，思考问题。他随时带领着他的学生们垦荒辟野，开拓前进。（详见本书附录四）

1939年至1943年，先生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开训诂学课，他一改前人从古书堆里讨生活的旧习，参酌中外文献，把训诂学和词汇学、语义学、语源学汇为一体，建立了自己的体系。我们看到先生的部分手稿和卡片、夹页当中，就有古词语及其古音构拟以及某些材料的外文书写形式等，有古文献和国外文献中与本书有关的部分语言资料。可见《语言与文化》一书的部分内容，在先生讲授训诂学时已经着手酝酿。本书自序中先生也说：“1943年夏天，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主办的文史学演讲会，我曾用‘语言与文化’这个题目公开演讲过一次，并且由马汉麟同学把演讲纲要记录下来；这本书的间架从那时起就建立起来了。”



1943年，先生应邀到云南大理县帮助重修县志。先生一面抽暇在大理中学找少数民族学生记录他们的语言，同时留意搜集有关文史资料。这就产生了连续在南开大学《边疆人文》和《边政公论》上发表的《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和《再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三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以及综合三文重订汇成的刊载在本书“附录一”的论文。这一论文确立了云南“南诏”族属是彝缅族的民家（白族）而不是侗台族的摆夷（傣族）的学术定论。我们从先生《苍洱之间》《蜀道难》两本游记中可以看出：先生在他公差外出和旅游途中，当旅伴们游山逛水的时候，他却随时还在搜集语言文史资料，有时还得挑灯夜战，埋头抄写。友人也帮助他搜集。一有所获，先生往往狂喜欢呼，体现了一位全身心投入的执著学者广泛的学术兴趣和念兹在兹的趣味和毅力。

1944年冬，先生应邀赴美讲学，仍继续他的资料搜集工作。先生在本书自序里说：“1945年旅居北美西岸的客来而忙（Claremont），每周末忙里偷闲地补充了一些材料，可是……始终没机会写定。”他的学生美国著名记者罗伯特·伊·沃克所写《罗常培在美国》一文里写道：“在朴茂纳大学的年鉴上这样写着：‘……东方语言的专家，同时也是学生习惯用语的专家（着重号是笔者加的）。他关于学生生活、学生用语、俚语等的研究是在学生饭厅、宿舍里的讨论会、

晚会以及其他学生集会的场合进行的。到处有他的足迹”；“朴茂纳大学校长伊·威尔逊·莱因，他本人也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学者和大学校长，就说过：朴茂纳从来‘……没看到一位外国学者这样如饥如渴地学习’”（《罗常培纪念论文集》第396，397页）。可以说明，本书许多材料也是先生赴美讲学期间先后搜集的。加上他在国内研究中外文献、调查少数民族语言时的札记和记录，取例赅括古今中外，尤其侧重国内少数民族和国外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的口语，从语言所反映出的文化因素，透视该民族的文化特点，形成了本书的框架和内容。这是先生从语言学的研究扩展到语言与民族文化关系方面的研究，从语言学跨进人类文化语言学的艰苦而坚实的探索。其目的是“给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搭起一座桥梁来”。

可以看出，一方面，先生主动接受萨丕尔、帕默尔、布龙菲尔德、泰勒、马邻诺斯基的语言学和文化学思想理论，体现了中西包容、互相补充借鉴的精神；同时他强调：“语言学的研究万不能抱残守缺地局限在语言本身的资料以内，必须扩大研究范围，让语言现象跟其他社会现象和意识联系起来，才能格外发挥语言的功能，阐扬语言学的原理。”因此，当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化语言学兴起时，学者们没有忘记先生筚路蓝缕之功，把先生和这本著作称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先驱’和‘开山之作’”。（见宋



永培等编著《中国文化语言学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本书最初由北京大学出版部于1950年出版，当时印数有限，分送友好以外，很快就卖完了。1989年又由语文出版社重印。重印之前发现初版存在一些排印上的错误，还有些译名同现在通用的译法不同；还有因材料不齐而遗留的问题，在罗先生自存的一本里夹有好几位先生签注的意见。重印时曾请北京大学东语系汪大年先生仔细校读了一遍，并加上了邢公畹先生撰写的序文。在编辑《罗常培文集》时，我们又对重印本作了核校。收入“大家小书”的《语言与文化》依据山东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罗常培文集》第五卷核校稿排印。



一 版 自 序

罗常培

这本书前七章的初稿是1949年1月28日深夜，就是夏历戊子除夕，才完成的。当时北京虽已和平解放，但人民解放军还没开进城内。在我写完末一个字把笔撂下的当儿，真没想到在北京解放的周年纪念日，它会全稿印就，将要跟学术界见面了！

1943年夏天，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主办的文史学讲演会，我曾经用“语言与文化”这个题目公开讲演过一次，并且由马汉麟同学把讲演纲要记录下来：这本书的间架从那时候就建立起来了。

1945年旅居北美西岸的客来而忙（Claremont），每周末忙里偷闲地补充了一些材料，可是一一直被别的事情打岔，始终没机会写定。1948年过完北京大学50周年校庆后，围城中无事可做，除了对于沙滩区同人的安全问题略效微劳以外，集中精力来写这本书。炮声和冷弹并没影响我“外愈喧而内愈静”的心理。记得当年长城战役促成我的《唐五代西北方音》，卢沟桥烽火促成我的《临川音系》；那时的心境虽然跟前年岁暮迥不相同，可是忠于所学的态度前后是一



致的。解放以后我的思想意识逐渐地起了转变，对于这本书的看法也放弃了“为学问而学问”的旧观点。所以经过相当时期的酝酿和学习，直到前七章都快印好了的时候，才把第八章“总结”做成。

全书的内容、旨趣和观点，在“引言”和“总结”两章里已经交代过了，这里无需再多说。材料虽是从各方面搜集来的，但贯串编排却是我自己的初次尝试。不用说，形式和实质上的缺陷当然很多，还希望读者们切实批评，好让它能有进一步的改善。

让我首先谢谢吴玉章、陆志韦、向觉明、季羨林几位先生！承他们详细地校阅原稿并给了很多有价值的批评或改正。吴、陆两位先生为鼓励著者，还分别给这本书题字、作序。其他对于这本书的完成，直接间接有所帮助的，除了在书里已经声谢的以外，我还得郑重地谢谢王利器、吴晓铃、周定一、俞敏、殷焕先、张清常、陈士林、喻世长、杨志玖、齐声乔诸位先生！他们对于补充材料、审核内容、校对印件各方面，分别尽了相当的力量。全稿的抄写是由许建中、张立仁两个同事协助完成的。

本书的刊行承北京大学出版委员会曾昭抡先生、出版部李续祖先生和诸位工友们帮了很大的忙。它现在所以能够和读者提早见面，完全靠他们的鼓励和合作。我在感谢之余同时觉悟到个人力量的渺小和集体力量的伟大！

1950年1月31日，北京解放周年纪念日，罗常培序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

一 版 序 言

陆志韦

自从语言跟文字分了家，语言的地位让象形文字占了去，人已经忘了语言是劳动的工具。一个民族的文化跟所谓思想方式全是手跟发音器官联同创造出来的。人要是不能说话，就不会有合群的工作，也不能把劳动的方法传授给别人。比较复杂一点的机器也全都是手跟口腔联络着工作，才能制造出来。先有语言然后有文字。文字至多不过是古人劳动的记录。文字脱离了语言，脱离了生产，哪里还能代表一个民族的文化呢？

莘田先生写了这本小书，书名是“语言与文化”，不是“文字与文化”。这在中国还是一种新的尝试，可是成绩已经是很可观了。我希望中国人的研究语言从此走上了科学的大路，也就是走上了群众路线。中国文化是中国大众的生活方式，中国话（特别是汉语）是中国人创造文化、传播文化的工具。所谓“文物制度”、“书画琴棋”，那是少数人的。汉字也是少数人的。

我念了莘田先生的书，不由得想到我们这些研究



中国文化的人是何等的可怜。比如我是研究汉语的语音史的，可老得在汉字上“钻点子”。前些年甚至于不敢把研究的目标说给人家听。莘田先生这书的内容大部分也还得在汉字上下功夫，因为中国话的历史全部是用汉字写下来的，除了少数民族的一些近代史料。

语言学的工作，它怎能配合上建国的事业，那得靠一些认清任务的人来继续努力，通同合作。中国话的条理，它的结构、范畴，究竟对于中国人的思想有什么关系，我们该怎样用语言的工具来改进中国文化，那工具本身该怎样修改，这些问题是极难回答的。

1950年1月，陆志韦敬祝莘田先生成功！